

# 幼稚园的兴起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

朱波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福建幼稚园的兴起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并受近代福建区域社会变迁的直接影响。近代福建幼稚园经历了清末西方殖民在闽兴办幼儿教育的发端, 到福建本土化幼稚园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探索”的发展演变。这一历程折射出“殖民”到“本土”的逻辑, 实质是反映了社会变迁进程中中西文化交融形成的张力对近代福建幼稚园的影响。

**[关键词]** 幼稚园; 近代福建; 幼儿教育;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K 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8) 01-0126-06

近代以降, 福建俨然成为了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汇的重要场域之一。这不仅仅表现在自然经济的解体、传统社会结构的日趋变质以及西化观念的新兴, 它更直接显现在文教事业的区域性演变发展。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 福建幼儿教育的近代化转型打上了西方殖民和福建本土的双重文化烙印。传统的幼儿家庭教育也正是在这种变迁的惯性中诞生了幼儿的社会教育机构场所——幼稚园。由此, 近代福建幼稚园被纳入到社会教育体系中, 为构建近代福建社会变迁的图景提供了重要镜像之一。国内学术界对近代幼稚园的研究成果, 散见于各地方教育史志文献中, 个别专文研究偏重于特定办学主体的考察, 如赵真的《近代福建教会幼稚园的办学实况》<sup>[1]</sup>、包峰的《教会幼稚园的兴办与中国新式幼儿教育的产生》<sup>[2]</sup>、简占东的《试论教会教育对近代福建教育现代化的影响》<sup>[3]</sup>, 以及偏向于对幼稚园宏观的整体研究, 如江露露的《中国近代幼稚园发展进程及特点》<sup>[4]</sup>、于淑真的《清末民初幼稚园的兴起与发展》<sup>[5]</sup>、方玉芬的《清末幼稚园教育发展日本化透视》<sup>[6]</sup>, 等等, 对具体的“区域场”即以近代区域社会空间和影响作为视角的研究较为薄弱。因此, 从微观的层面上对近代福建幼稚园进行深入的考察, 有助于我们窥探近代福建社会变迁的特征表现及其意义。

## 一、文化殖民：幼儿教育“西学东渐”的嚆矢

1842年, 厦门、福州通商口岸相继开辟, 福建成为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入侵的前沿堡垒。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势力也随之涌入福建, 包括美国浸礼会、归正教会、美以美会, 英国的圣公会、伦敦公会、长老会和法国、西班牙的天主教会等陆续在厦门、福州、古田、莆田、南安、漳浦等地取得办学特权。这些教会学校的规模和数量都居全国前列。19世纪80年代, 西方教会势力相继在厦门、福州沿海开放港口创办幼儿教育机构, 以后西方教会在福建区域兴办的幼稚园数量逐渐增多。

“幼稚园”作为构成西方近代幼儿教育的实物形态, 对中国而言无疑是舶来品, 它既是发轫于“正在中英南京条约成立之后, 五口通商初开, 始许各国传教内地之权”<sup>[7]1</sup>, 又是西方觊觎中国儿童事业的附属物, 他们认为“传布新宗教于成人, 戛戛乎其难。以其宗教观念已结晶, 其习惯已成熟。不若布道于年华幼稚之人, 既易接受, 又富于保存性。此基督教教育所以注重儿童事业而视为布道之良机也”。<sup>[7]19</sup>在一定意义上, 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文化领域获得了幼儿教育占有权, 并通过这一占有权, 西方殖民国家不

断地消解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

在运作逻辑上,西方殖民在福建创办幼儿教育沿袭渐进的策略,实现其扩张的目的。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包括教会及其教士们)总是以“慈善”的面孔,推广各类的慈幼事业项目,一般有育婴堂、怜儿堂、育幼院、养济院、孤儿院等,极大改变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只注重收养而缺乏教育的缺陷。他们往往在这些慈幼机构中附办幼稚园,开设有关宗教、绘画、手工等系列文化课程供收养者学习,从而增强慈幼机构的教育功能。1887年,由归正会公打马字大姑娘清洁和长老会安玉瑜姑娘携手创办的女童养育院“怜儿堂”建于鼓浪屿升旗山麓<sup>[8]</sup>;1893年英国安立甘会女传教士颜师姑在古田新义山育婴堂内设幼稚园<sup>[9]</sup>;光绪二十九年(1903),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惠邑堂会在教堂内设立学塾时,增收五六名幼儿教育入塾教养。<sup>[10]</sup>由此可见,西方殖民在闽开办的慈幼事业,不仅体现了福建传统慈幼事业的现代性转型,而且为催化福建幼儿教育的外延机制即幼儿学校化教育起到了加速作用。另一方面,在西方殖民浪潮的冲击下,福建女学纷纷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破茧而出,进而客观上也为福建幼儿教育走出家庭蒙养开了先河并积累了办学经验。光绪十六年(1890)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培英女校,初时为带有幼稚园性质的蒙学<sup>①</sup>;1894年,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记载:“又有嘉日敏罗马利二女士驻漳,振兴妇女学校,并创设幼稚园,此幼稚园之设,乃在厦门之先”<sup>[11]</sup>。1914年由西教士李德安在仙游县城西门外七级创办道德女学增设幼稚园<sup>[12]</sup>;在教会女校中附设幼儿班,或者单纯的幼稚园,增强教会办学功能和导向,为近代女性解放尤其职业选择提供了现实路径。这种女学与幼儿教育的关联,显然是福建区域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在美国传教士麦女士看来:“中国一国之内,至少应有幼稚园师范养成学校,专门养育幼稚园人才,为女子者无论路途辽远,应送之入此学校,若有中国布道者,不信幼稚园之力,亦应使其再研究此问题,则幼稚园自能发达矣。”<sup>[13]</sup>女性角色对

教会早期幼稚教育的意义亦为在闽的西方教会人士所熟识,因此,女性群体“不孚所料”成为了近代福建幼儿教育师资的开拓者和从业者。

在幼儿教育师资上,西方殖民势力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切入口,遂使福建成为教育西学东渐的风气之先。1892年2月,英国长老会在厦门鼓浪屿创办幼稚师资班,<sup>[14]</sup>后改名为怀德幼稚师范学校。该校附设幼稚园,供学生实习,规模相当可观。<sup>[15]</sup>1916年,美英在福州的美以美会、公理会、圣公会等三教会在福州鳌峰坊合办福州协和女子幼稚师范学校。<sup>[16]</sup>该校附设幼稚园及校外附属之德尔幼稚园、东门幼稚园及洪山幼稚园三处。<sup>[17]</sup><sup>[14]</sup>这两所教会幼稚师范学校成为近代福建培育早期幼稚师资的主要来源,并为福建本土幼儿教育机构创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不仅如此,幼稚师范在实践中极大推动了福建幼稚园的“破茧而出”,为最终福建幼儿教育机构的转型换代奠定了基础。

西方殖民在闽办学给福建文化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从而使以教会教育为代表的西方幼儿教育机构,在无意识中为福建幼儿教育的转型起了启引作用。近代福建教会幼稚园办学较之于沿海其他省份得以较早尝试,不仅传授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等西方幼儿教育形式和内容,如与“恩物”相联系的游戏、作业,而且注重儿童的感官训练和心理活动,强调儿童的兴趣和技能。古田养正幼稚园,户外有幼儿活动场,配备滑梯、翘板、浪船、攀架、摇马等儿童活动器具;室内有幼儿活动厅,摆放幼儿玩具及供幼儿创造性游戏用的沙盘和积木箱等,适宜于幼儿的身心发展<sup>②</sup>。教会幼稚园的创办不仅填补了福建幼儿教育系统的空白,也带来了先进的儿童观、教学方法等,为近代福建本土幼稚园的产生树立了典范。但在西方殖民者开辟教会学校的同时,对幼小儿童灌输文化殖民观念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集中表现在宗教课程如主日学等开设过于牵强附会,教学上多采用圣经语录、圣经故事、圣经歌曲等,西化殖民色彩强烈,宗教意识形态突出,这被视为虐害近代福建幼小儿童精神世界的主要原因。

① 王挥:《泉州市区教育志稿》(内部资料),2001年,第30-31页。

② 福建省教育史志编写办公室:《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8辑),1992年,第213页。

## 二、从“自我意识”到“本土探索”：幼稚园内涵的全面展开

随着女学的开禁和西方教会“幼稚园”的示范作用,清末福建官方与民间逐渐关注幼儿学校化教育问题。光绪三十三年(1907),闽督在《附奏创办幼稚园片》中称:“因查闽省各学校均已次第兴办,惟幼稚园尚付阙如,殊不知以资保育而重始基,当经檄飭蕃学两司会同学界绅董悉心筹商。”<sup>[18]287</sup>是年,省拨官屋玉尺山房为园所,开办闽山幼稚园,成为福建近代最早的公立幼稚园。同时,闽省士绅联合成立孝义里幼稚园,吸收3至7岁幼儿126名入学,保育员多为识字妇女。<sup>[19]144</sup>迨清代末年,福建国人办的幼稚园共有3所。<sup>[20]</sup>可见,与居全国首位的福建教会幼稚园数量相比,清末福建本土化幼稚园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这批幼稚园发展并不成熟,且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但毕竟是福建省内国人开启幼稚教育的先见之门,尤其在创办的过程中获得了实质性的办学经验和教训,为近代福建幼儿教育的独立办学提供了样板。

民国初期(1912—1927),福建军阀派系林立,战乱频繁,民生凋敝,致使福建文教整体事业停滞不前。但是在福、厦、漳、泉为主的沿海区域,幼儿教育在曲折中发展。以福州为例,1927年福州已有省立、县立幼稚园(班)近10所。<sup>[21]169</sup>这一时期,福建本土幼稚园的办学主体呈现多样化,既有教育部门主导办学,还有民众联合办学或单独办学,甚至具有区域特色的华侨、华人办学。而在办学形式上较之前渐显多元化趋势,其中包括独立幼稚园、师范班附属幼稚园、小学附设幼稚园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华侨、华人在资助或创办幼儿教育中独占鳌头。1919年2月福建侨领陈嘉庚创办集美幼稚园;1923年南安斗南小学附设的幼儿班;1924年泉州华侨女子师范附设的幼儿班;1925年晋江安

海进化女学附设的幼稚园等等。<sup>[18]347</sup>尽管在新旧文化的翰墨缘分的特殊时期,福建本土幼稚园在教学内容上或多或少仿照欧美或日本式幼儿教育的遗风,但是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尤其是近代幼稚园教育的新理念,不断塑造、激荡着福建幼儿教育从“自我意识”到“本土探索”的角色行动。这一行动传导在早期可能更多借力于福建华人华侨的幼稚园办学实践,从而驱使近代福建幼儿教育从殖民到本土的华丽转身。有鉴于此,从集美幼稚园的办学史实中可略窥一斑,“本园自始采仿美国幼稚园分级制,把幼稚园分为二学年分做四学期……现又把新旧打破,分设第一中心第二中心第三中心幼稚园三所”<sup>①</sup>;“洪林中心幼稚园是本校创设的,幼稚教育在教育上的重要,和目前中国乡村需要的迫切,已不待赘言”<sup>②</sup>。甚至陈嘉庚校主认为:只有在闽南研究现代闽南的幼稚教育,才会彻底,才会亲切<sup>③</sup>。如果说时代性、地方性是集美幼稚园办学过程反映的两个显著特征,这实际上预示着福建本土幼稚园的宣行以及对本土化幼儿教育主动探索的根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福建时局依然未得到真正改观,不断遭受土匪之乱、抗日战争的摧残以及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但是,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潮的传播和推动,这一时期的福建社会较之前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在程时燧<sup>④</sup>、郑贞文<sup>⑤</sup>等多任教育厅厅长对福建省教育事业整顿、改革,为之后福建各级各类教育走向正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福建幼儿教育也随之迎来了发展较快时期。据统计,1928年全省有19县市设立39所幼稚园(班),入学儿童2200人。至1936年,全省设有106所幼稚园(班),入学儿童7054人。<sup>[21]40</sup>从1930—1936年年均增长速度来看,福建幼稚园所增长率高于全国1.29个百分点<sup>⑥</sup>。这一时期福建省幼稚园不仅“各省立小学次第附设幼稚园,而各县办的省立小学亦有添设幼稚班,且各县教育局尚有自行筹款单设幼稚园

① 集美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编辑部编:《集美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1933年,第828、836页。

②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史志研究室:《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9辑),1992年,第71页。

③ 程时燧(1890—1940),字柏庐,江西新建人,1928年至1932年期间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④ 郑贞文(1891—1969),字心南,祖籍福建长乐,1932年至1943年期间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⑤ 福建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教育史志研究会:《福建教育特色的探索》,1992年,第97页。

者”<sup>[21]40</sup>。在幼稚园数量增长的同时，福建省幼稚教育师资培训和教育实验工作也得到了发展，近代福建幼儿教育的本土化探索呈现蔚然的气象。1929年省立福州高级中学增设两年制幼稚师范科；1936年7月，省立福建师范学校附设三年制幼稚师范科。<sup>[17]82</sup>1929年福建省实施幼稚园教员的登记及检定办法，开展幼稚园合格教师工作的成效一度在全国享有声誉。同年，福建省教育厅研究部召开省立小学校长（幼稚园长）谈话会，决议成立福建省会小学中心教育研究会，分高、中、低（幼）三个阶段。<sup>[19]193</sup>1936年省立福州第四小学编辑出版《教育问题研究》刊物，其中发表《幼稚园教师应与儿童家庭联络的必要》的论文<sup>①</sup>。虽然囿于当时办学经费的匮乏，教研工作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但却推动了全省地方幼稚园教育工作的开展，幼稚园教育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由于西方殖民者文化侵略和教育主权的篡夺，20世纪20年代以后福建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1927年福建省教育厅先后制定《未经立案学校之取缔办法》《私立学校立案须知》，加强教会幼稚园规范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幼稚园办学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福建幼稚园的办学不但从城市进入农村，而且对农村幼稚教育给予理论和实践的关注。在闽西，民国期间社会集资办的幼稚园有13所，18个班。<sup>[22]</sup>1930年福州乡村师范教育参观团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乡村师范实验小学幼稚园部进行考察，并总结其经验：“辅助乡村儿童家庭之不足，减少乡间农忙时照顾儿童之困难，研究实验适合乡村需要的幼稚教育式教学。”<sup>②</sup>1932年由晋江乡村师范教务主任郭人全主编《农村教育》一书，在阐述农村幼稚园教育之意义中强调：“而在社会的意义与教育的需要上，农村之幼稚教育的需要，自远过于都市，农民子女之应当享受幼稚教育的权利，亦远过于都市之富人的家庭。”<sup>[23]</sup>更有甚者，《龙溪教育月刊》在30年刊出了全县校长会议的提案，其中包括《推行乡村成人教育及试办乡村幼稚园案》《乡村各区

应在中心点设立幼稚园案》等。上述提案不仅阐述了创办农村幼稚园“俾益农妇极大”的观点，而且认为“乡村各区均未设立致幼稚教育多至不全而妨碍初级小学教法不浅”<sup>[24]</sup>。显而易见，在广袤而贫瘠的民国福建农村践行幼稚教育办学，它是一项“时艰不可济”的社会事业，然而，无论地方当局或者个人对农村幼稚园的发声，却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福建幼儿教育本土探索的烙印。

而此时对幼稚园的重视，也集中反映在文字出版事业的态度上，先后出现一批地方刊物、报纸及教育报告，包括《福建教育》《福建教育通讯》《集美周刊》《龙溪教育》《二年来龙溪教育概况》《二十一年度龙溪教育》等，都不同程度涉猎或观照该时期福建幼稚园办学的实践处境。尤其是1936年《福建教育》在第二卷第六期专门推出“幼稚教育特辑”栏目，刊发了《什么是幼稚教育》《幼稚园教育的新趋势》《幼稚园的社会与自然》等文章，都从较科学的理论视域宣扬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幼稚园办学的自主性。这些刊物活动以文字编辑为辅助，籍以传播各种教育新思潮，鼓吹本土幼稚园的独立意识，其带来的区域社会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 三、社会变迁：对“幼稚园”形象的建构与透视

在对近代福建幼稚园从“殖民”到“本土”的逻辑推演中，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福建区域社会变迁的轨迹是与其何等相似。那么何谓“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的发展，二者都是变迁的实体，缺一不可。<sup>[25]</sup>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近代福建幼稚园的建构是一种多维度、深层次的动态和历史的考察。纵观近代福建区域社会结构的诸多变化，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即是殖民文化的入侵行径和本土文化的被动承接过程，在这一历史语境下福建幼稚园从社会变迁中走向历史的舞台。在殖民文化浸淫下的福建社会，按照陶行知先生刻画中国幼稚

① 省四小学研究部：《教育问题研究》，1936年，第92页。

② 福州乡村师范教育参观团：《福州乡村师范教育参观团教育参观报告》，1931年，第50页。

园的直观特征,即:一是外国病;二是化(花)钱病;三是富贵病<sup>[26]</sup>;对福建“幼稚园”而言,这些特征亦是其形象的生动阐释,为我们传递最为真实的场景记忆。另一方面,在近代福建自然经济解体进程中,新兴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的诞生成为近代福建区域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他们对兴办“幼稚园”摇旗呐喊,不断扮演着对地方本土文化回归的先锋角色。集美幼稚园的践后证明,陈嘉庚校主和张宗麟先生各自为代表的新兴阶层共同致力于幼稚园的本土化建设,反映近代福建幼稚园的共同醒目色彩。这些色彩亦可以从张宗麟先生在参观龙溪育婴幼稚园的笔下描述中折射:“从许多设备与材料上观察所得,我觉得这个幼稚园富有朝气,肯研究,主持的人对于幼稚园,似乎已经有了极重的癖的。”<sup>[27]</sup>显然,这是张宗麟先生心中所勾勒的中国式幼稚园的本土形象,它亦是知识阶层对近代福建社会变迁中幼稚园形象的审视。

从人的发展而言,“幼稚园”体现了人们为解放和关爱幼小儿童所进行的努力,“幼稚园”的一切成果,不仅促进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而且有助于儿童成人两者之间关系调整,更有助于摆脱“父为子纲”的封建人伦依附思想的束缚,从而推动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近代福建幼稚园的兴起向人们揭示,幼稚园的兴起是作为近代福建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亦是人们在特殊社会环境中开启幼儿认知的思想过程。这一生成过程集中表现在地方报刊、杂志、宣传册子的议论文字上。张景崧在《幼稚园师资在教育上的地位》一文可以看作对“幼儿”认知的范本,他指出:“儿童在幼稚时期是在人生的各时期当中,占据一个最重要最危险的了。所以最初六年间的幼儿生活,是教育的一切基本,是完成人类生活的初基,在他后天的上的感情,的智慧,的生理,的思想,和道德是有极大关系的了。”<sup>[28]</sup>张景崧显然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幼儿的重要性与幼稚园教育的相互关系。因此,这些对幼儿的认知记录,不仅建构起近代福建知识阶层视野下的幼稚园形象,更是构成了近代福建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近代福建幼稚园的兴起是区域社会变迁下中西文化演变的产物。从时间向度来

看,近代福建幼稚园体现了传统幼儿教育的近代化转型,是传统幼儿教育在近代时期的“华丽转身”;从空间向度来看,它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锋中区域社会变迁的产物。然而,在区域社会变迁中,近代福建幼稚园形象的底色,既不能用殖民化也不能用本土化来一语概之。两种来自不同文化类型的幼稚园,始终按照文化包容的特性呈现胶合之状。即使是近代早期福建教会幼稚园,它也难免要顺应地方传统文化进行适域化过程。质言之,透视近代福建幼稚园形象并不是从殖民色彩到本土色彩简单的迁移,而是在批判、借鉴西方教会幼稚园的基础上,与地方本土文化进行交融而最终形成的本土化幼稚园。如上所述,近代福建幼稚园的兴起,不自觉地充当了福建幼儿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动力引擎,在中西文化的张力中见证了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

#### [参考文献]

- [1] 赵真. 近代福建教会幼稚园的办学实况及影响[J].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7(1): 95-98.
- [2] 包峰. 教会幼稚园的兴办与中国新式幼儿教育的产生[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08(2): 93-95.
- [3] 简占东. 试论教会教育对近代福建教育现代化的影响[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08(10): 60-63.
- [4] 江露露. 中国近代幼稚园发展进程及特点[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3(2): 169-173.
- [5] 于淑真. 清末民初幼稚园的兴起与发展[J]. 兰台纵横, 2013(10): 140-142.
- [6] 方玉芬. 清末幼稚园教育发展日本化透视[J]. 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 2007(5): 53-56.
- [7] 林显芳. 福州美以美年会史[M]. 福州: 福州知行印刷所, 1936.
- [8] 德庸. 美国归正教在厦门(1842-1951)[M]. 台北: 龙腾腾文化有限公司, 2013: 168.
- [9] 杨齐福. 近代福建社会史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35.
- [10] 王映辉. 泉州教育史(远古至清朝)[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315.
- [11] 周之德. 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M]. 中华书局, 1944: 19.
- [12] 王福梅. 莆田基督教会(新教)之研究(1863-1949年)[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02: 38.
- [13] 李楚材.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238.
- [14] 唐淑，寇崇玲. 1889-1949 中国学前儿童教育大事记 [J]. 学前教育研究，2003 (2)：22-23.
- [15] 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 近代厦门教育档案资料 [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29.
- [16] 檀仁梅，庄明水. 福建师范教育史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22.
- [17] 福建省档案馆. 老福建——岁月的回眸 [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
- [18] 刘海峰，庄明水. 福建教育史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 [19] 郑勇. 福州教育史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 [20] 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 福建省志·教育志 [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86.
- [21] 郑坦. 福建省教育概况及社会教育法令 [M]. 福州：福州环球印书馆，1938.
- [22] 钟德彪. 闽西乡村社会研究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26.
- [23] 郭人全. 农村教育 [M]. 上海：上海黎明书局出版，1932：213-214.
- [24] 王淑琴. 推行乡村成人教育及试办乡村幼稚园案 [J]. 龙溪教育月刊，1930 (1)：19.
- [25] 吕美颐. 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4)：5-11.
- [26] 喻琴，喻本华. 陶行知幼儿教育名篇选读 [M]. 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39.
- [27] 张沪. 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442.
- [28] 张景崧. 幼稚园师资在教育上的地位 [J]. 福建教育周刊，1929 (24)：9-12.

## The Rise of Kindergartens and the Social Changes of Modern Fujian

ZHU Bo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ldren educ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reflects the general rul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s influenced directly by the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Fujian. The modern kindergarten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of the western coloniz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rocess reflects the logic of “colonization” to “localization”, which expo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kindergarten; modern Fuji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ocial change

(责任编辑 杨中启)